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tephan Haggard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美] 斯蒂芬·哈格德 著 / 刘丰 译

Copyright© 2000 by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Institute.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2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 (美) 哈格德著; 刘丰
译.—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2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SBN 978-7-80762-992-4

I. 亚… II. ①哈…②刘… III. 金融危机—研究—亚洲
IV. F83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7775号

书 名：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著 者：[美]哈格德
译 者：刘 丰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史 宁
装帧设计：SDDoffice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22.75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992-4
定 价：3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国际编委会

Ha-Joon Chang(剑桥大学经济学院)

Peter Evan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Peter Gourevitc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Stephan Haggar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Peter Hall(哈佛大学政府系)

David C. Kang(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

Peter Katzenstein(康乃尔大学政府系)

Michael Man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Atul Kohli(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Margaret Lev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Mathews(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

Joel Migdal(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Gregory Noble(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Ove Pedersen(哥本哈根商学院商业与政治国际中心)

Adam Przeworski(纽约大学政治学系)

Herman M. Schwartz(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

Linda Weiss(悉尼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Meredith Jung-En Woo(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Zys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 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 1965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

的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清楚地理解国家概念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杨洋女士的具体联系工作。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石。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 1780 年、1880 年，还是在 1980 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 1780 年生产服装提升到 1880 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 1980 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

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观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作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献 给 南 希

中文版序言

在写作《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时，我的目的很简单——想要考察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 1997 年至 1998 年这场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解决的。在写作这篇中文版序言之际，美国自身也在经受一场相当复杂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这场危机很可能从许多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显然，金融危机的话题仍然是至关重要，而且令人伤心的是，它不大可能离我们而去。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济增长迅速瓦解，不仅对我们谈到的这几个国家是一场冲击，对该地区的学者而言也是如此。曾经的经济奇迹怎么会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困境呢？在当时，许多对东亚的国家干预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金融危机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结果。但是，对危机的主流解释是国际性的：即过度借贷和过早的资本项目(capital account)自由化是接踵而至的金融崩溃的必要条件，或许甚至是充分条件。批评者们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有欠妥当的短期措施和长期改革，致使情况更为恶化，而不是帮助这些国家走出困境。

不过，即便是那些强调国际联系的人也意识到，有效监管的缺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政治学者而言，监管乏力不单纯是一种政策失灵，相反，它反映出政府遭到了俘获，这一点必须做出解释。随着几个国家开始对金融和公司领域进行重组的复杂过程，很快变得显而易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外资银行家并不是这场游戏中惟一重要的参与者，重组很快显露出围绕着金融和公司资产控制展开的根深蒂固的矛盾。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对私人投资者提供了担保和扶持，可能对东亚的快速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随

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关系也造成了很大的风险,1997年至1998年的危机表明了这一点。危机之后,地区内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都试图对管理金融和公司领域的规章制度进行改革,以改善公司治理。

考虑到中国的经验,当我们在十年之后重新审视这场危机时,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训呢?当然,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并没有遭受这场危机,对这一点至少有一种解释,即中国对金融自由化的政策更为谨慎。时至今日,中国的领导层扭转了更广泛的金融开放的压力,在许多重要的改革上倾向于它所选择的谨慎小心的道路。虽然这种策略规避了危机,但是它并非没有带来负面影响。大多数外界人士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累积——也是1997年至1998年之后所有的危机国家推行的一种策略——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造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重大失衡。中国的应对之道将是与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避免仓促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确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但是它的影响被持续的快速增长所掩盖。与其他许多亚洲经济体一样,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主导的,这些银行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大多数集中在国有企业领域。支持这个过程的观点认为,它是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社会成本;不太支持的观点则强调,让造成亏损的企业继续经营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决策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处境艰难的银行业体系,并且投入数十亿美元以减小不良贷款的规模。一方面,这种努力是成功的:中国的银行业体系没有像其他的亚洲经济体一样在危机中出现崩溃;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和公司领域的许多特征仍不明朗,金融体系似乎仍对向私营部门提供借贷心存芥蒂。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核心的困惑在于,私营部门在缺乏法律保护 and 正规融资渠道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主流的解释认为,声誉和其他以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法律环境,因此并不需要改革。我对此

并不确定,但是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历表明,政府——金融业——公司关系如果使企业免于市场竞争和亏损结果,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显然,由于中国的金融业缺乏透明度,仍然存在着许多风险,正如美国金融业中成功逃避监管的一些部门仍然存在的风险一样。

虽然目前中国金融发展的政治学还是一部待写之作,但是我对它的前景感到振奋不已。随着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们对 1997 年至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学进行思考,我希望由此会激发他们把这种分析方式扩展到中国的金融业如今正在经历的发展上。这些发展包括,银行业的不断改革、外资进入的自由化、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的繁荣(有时是“爆炸性的”)发展。重要的政策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哪些人从中获益,哪些人又从中受损? 中国的民众多大程度上从这些决定中获益,或者承担了这些决定的成本? 我相信这本书的翻译将会有助于大家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

我要对刘丰在翻译此书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感谢丛书主编让我著作的中文版得以面世。

斯蒂芬·哈格德

2008 年 4 月 28 日

序 言

说来有些不幸,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的金融危机的研究一直是研究所成立以来的一项要务。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的《国际债务与世界经济的稳定》(*International Debt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World Economy*, 1983)和《国际债务:系统性风险与政策应对》(*International Debt: Systemic Risk and Policy Response*, 1984)都是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最早的系统分析。C. 弗雷德·伯格斯特滕(C. Fred Bergsten)、克莱因和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合著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贷款:政策选择》(*Bank Lend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Alternatives*, 1985)一书。在《债务减免的自愿方案》(*Voluntary Approaches to Debt Relief*, 1988)一书中,威廉森确立了一种新的策略。克莱因在《重新审视国际债务》(*International Debt Re-examined*, 1995)中回顾了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

研究所同样积极致力于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危机问题。吉耶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莫里斯·戈尔茨坦(Morris Goldstein)和爱德华·霍克赖特(Eduard Hochreiter)考察了《墨西哥危机之后私人资本流向新兴市场》(*Private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after the Mexican Crisis*, 1996)。戈尔茨坦的《亚洲金融危机:原因、对策和系统性启示》(*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Cures, and Systemic Implications*, 1998)是这个问题最早的介绍之一,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等人推出了《亚洲货币贬值的全球性经济影响》(*Global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sian Currency Devaluations*, 1998)。

为了帮助防范未来的危机,我们最近出版了戈尔茨坦、格雷西·卡明斯基(Graciela Kaminsky)和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的分析——《评估金融脆弱性:新兴市场的早期预警系统》(*Assess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merging Markets*, 2000)。

截止到2000年中期,除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亚洲经济体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复苏势头。但是,危机之后采取的改革是否已经消除了未来的风险根源?如此令人困惑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而且最终依赖于政治。危机所催生的改革在政治上能够长久维持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xi]研究所延请政治学家斯蒂芬·哈格德撰写《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哈格德的首要目的在于考察,在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政治是如何对危机的爆发起作用的。他指出,东亚政商关系(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的性质利弊兼有。问题并不像之前有关这一地区的文献中的传统认识那样完全来自于产业政策,而是因为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国家直接干预到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引发了许多众所周知的风险,包括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但是,金融体系自由化的努力也产生了风险。监管机构缺乏监督新的活动的的能力。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为寻求放宽监管和置身法外而游说。它们试图将自身活动的成本转嫁到政府以及最终到纳税人头上。

政治也影响到金融灾难发生后政府如何对其进行处理。在整个地区,商业抵制延缓了改革进程。选举政治在民主国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一项重要发现在于,在应对危机方面民主国家并不比威权政府更糟糕。在韩国,金大中在任期之初其实就调动了广泛的民众和立法支持,来启动范围广泛的改革。在应对过程中,泰国分散的政党制被证明是比较迟缓的,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日益脆弱的总统完全无力打破长期存在的任人唯亲和腐败的模式。经济管理不善引发了民众抗议,而且导致了军方叛变。尽管这起到了给印度尼西亚带来民主的积极影响,

但是由此产生的政治不确定性造成了这个地区内最持久、最深重的经济衰退。

哈格德也剖析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采取的有悖常理的方案。施加资本管制是为了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重新获得一些自主权。但是,在马哈蒂尔总理 1997 年秋打击“投机者”的行动中,这一举措也有它的政治根源,这场行动加剧了马来西亚的困境。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延续性也具有延缓经济改革步伐的影响。

除了痛苦的短期调整之外,危机也给这个地区的政府提出了两方面的长期任务:金融和公司重组,以及社会契约的重新制订。由于银行和企业试图把损失转嫁给政府,金融和公司重组表现得困难重重。一些政府(特别是韩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行动迅速,而印度尼西亚依然面临令人畏缩的调整问题。

不过,哈格德认为危机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改革正在重塑地区内的竞争规则。【xii】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以及指导破产和公司治理的新规则。东亚资本主义可能并不会向西方模式趋同,但是危机对该地区商业组织的性质有着深远影响。

最后,哈格德阐述了危机的社会危害。他发现改革者的存在限制了反对的程度,这些改革者从更具市场导向的改革中获得了政治和社会收益。然而,他也指出,这个地区的政府在处理危机的社会后果方面显得捉襟见肘,长久以来过于依赖非正式的社会保险机制。

由此,哈格德的发现与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研究《全球化走得太远?》(*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1997)相呼应。开放经济体获得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收益,但是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来保障开放性得以延续。哈格德为未来草拟了一份能够让亚洲继续将经济增长和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合起来的社会议程。

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是一家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政策的私人非营利机构。其宗旨是分析这个领域至关重要的议题,并且提出和传播应对这些问题的实用的新

方案。研究所完全没有党派倾向。

研究所的资金很大程度上由慈善基金会提供。目前,主要的机构资助来自于小威廉·M.凯克基金会(William M. Keck, Jr. Foundation)和斯塔尔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其他许多基金会和私营企业为研究所及其多元化的财政资源做出了贡献。在过去的一个财政年度中,研究所约有26%的资源来自美国以外,其中约有11%来自日本。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斯塔尔基金会、通用电气基金会(GE Foundation)和弗里曼基金会(Freeman Foundation)为这个项目提供了慷慨资助。

董事会履行研究所的全面职责,从总体上指导和批准其研究项目——包括确定那些可能会在中期(一至三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变得重要的议题,以及研究所应该解决的议题。所长在研究人员和外部顾问委员会的紧密协作下,负责特定项目的开发,并最终决定某项研究的出版。

研究所希望,我们从事的研究和其他活动将会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政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做出贡献。我们诚邀这些出版物的读者们建言献策,让我们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

C. 弗雷德·伯格斯滕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2000年8月

【xiii】